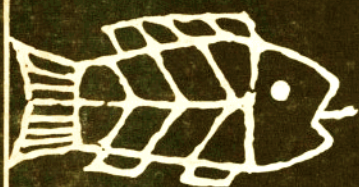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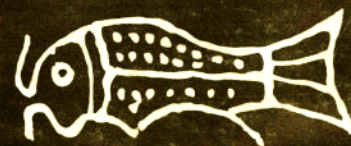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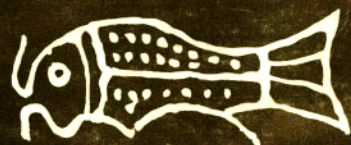


河南史志资料



第五辑



河南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说 明

鉴于单位名称的改变，自第五辑起，原《河南地方志征文资料选》改名为《河南史志资料》，仍不定期内部印行。《河南史志资料》将继续刊登《关于征集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料的通告》所列举的各类文字资料和历史图片，包括专题论文、资料长编、重要的档案、旧报刊资料、函电、日记、笔记、回忆录、族谱、年表、统计图表、译著、民谣、索引等，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提供这方面的稿件。

限于目前的编辑力量和水平，错误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切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更
正

本辑16页倒数第4行“新华报”应为“新中华报”，倒数第7行“总”字，应为“志”字。特此更正。

封底《地方志编纂手册》的函购时间，推迟至七月十日。

河南史志资料

(第五辑)

-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河南农民运动……庞守信 (1)
- 回顾抗战初期嵇文甫与范文澜先生在河南
的抗日活动……………嵇道之 (17)
- 从烦恼到快乐……………范文澜 (22)
- 鄂豫边区卫生工作发展概况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卫生工作史料编写组 (29)
-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人民负担政策的演变
过程概述……………李雄治 (38)
- 张国焘与光山白雀园“肃反”……………嵇立群 (45)
-
- 钧瓷发展史概述……………杨恒珊 (50)
- 关于英商福公司几个问题的管见……………薛毅 (54)
- 国民二军在河南的兴败……………蒋相炎 (56)
- 民国时期河南省田赋概况……………赵伯燕 (73)
-
- 一九〇三年河南人民反抗“钱粮改章”的斗争……………周源 (76)
- 《中国新女界杂志》及其女权主张……………豫人 (81)
- 试评坚持共和反袁专制的《开封民立报》……………李国强 (88)
-
- 明清时期河南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李威 (93)
- 清代河南申报创建概略……………严家清 刘昌源 (102)
- 元明时期原阳黑洋山转漕济运史略
……………朱兆普 孙九英 (106)
- 北宋开封的戏曲演出……………王复兴 (109)
- 黄埔军校中的河南学生名录……………蒋晔摘录 (113)
- 河南籍书画家拾古……………张冠生 (117)
-
- 河南地方史志索引丛编一九八二、八三年度总目…………… (16)
-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图书资料室藏报刊资料目录…………… (108)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河南农民运动

庞 守 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河南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在河南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本文拟就此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意义，作一些粗浅的探讨，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灾难沉重的河南农民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河南总人口约有三千万。因处中原腹地，商业既不发达，工业更为落后，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据有人估计，仅自耕农、半自耕农就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①他们在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压迫下，痛苦日益沉重。

“天下有事，中原必争”。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胡憨战争和国吴战争，河南人民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一年之内，令征数年之粮，别立名目，杂捐百征；而军队过境又毫无纪律，迫民出宅，强住民房，家居什物捣毁一空”。^②冯、赵郑州之役，胡憨之战和国吴之战，河南又直接沦为战场，战区广大人民遭受了巨大摧残，村舍为墟，财物荡尽，死亡枕籍，惨不忍睹。

由于战争频繁，军阀不断扩充兵额，致使河南驻军日渐增多，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人民“所受战争影响，比战祸还要厉害”。^③赵倜统治时期供养军队十余万，吴佩孚统治时期增至二十余万；及至吴佩孚东山再起，二次入豫，河南的驻军竟达四十万。^④巨额的军费负担大都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如豫西卢氏县，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驻陕军两团，全由当地供应。人民每月须缴正饷银二万九千元（粮草杂项尚不在内）。反动县署迫令人民按不动产计征完纳：不动产在百元者，月纳五元；在五千元者，月纳五十元。缴纳稍迟，即遭拘押，县狱中关押之农民常达百数十人，日夜严刑拷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往往血肉横飞，因以毙命。^⑤一九二六年河南“每月军需一百六十四万一千元，一年军需一千九百六十九万二千元。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不过二千万，仅够支军饷，其他还有政费”。^⑥因此，各地驻军多无固定饷银，“都是就地勒索，硬派日用品”，“强要农民负担”。在豫东之杞县，一九二六年田赋地丁一项，“早就收到十三万五千两”，后又“改两为洋，每两折合二元二角，共计合洋二十九万七千元。此外，漕米全县合计八万多串。地亩捐，每亩地丁四百文，漕米一百文。兵差支应局车马费，每亩五十文；随车马行送兵费，每亩三十文；保卫团费，每亩十文。民国十五年秋，吴佩孚摊派军用借款，全县五万元，富户捐二万元”。另外还有“麻袋捐八千元，粮秫作价征收五万元，金库流通券硬派五万元。面料、柴草费，每亩八十

文至一百二十文不等。民国十五年一年内，收至三次之多”。在豫南各县，“地亩附加捐，每两附加到十三元。河南全省无论那一县，摊捐派饷都一样”。⑦不仅如此，一九二六年就预征到一九二九年的钱粮。⑧

军阀混战又是匪患猖獗的重要根源。战胜者扩大兵额，战败者流落为匪。“河南是战胜者必争的地盘，同时又是各方溃兵土匪的老家”，“所以土匪的数目，在全国为最多”。⑨一九二二年，冯、赵郑州之役就是突出的例证。此役赵倜全军覆没，溃兵四窜，大都流为杆匪，致使全省各地土匪蜂起，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官军往往“不剿匪而通匪，假以枪械，济以子弹”，⑩因而匪势日炽，民无以为生；以“老洋人”张庆为头目的数万匪众，连年窜扰豫、鄂、皖、陕数省，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之连年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豪绅地主阶级的重租、高利盘剥，河南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压迫愈烈反抗愈甚。各地农民纷纷组织红枪会、黄枪会、天门会等各种武装团体，抗拒抗税，防匪自卫。一九二三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夏，卢氏县十数万农民，三次包围县城，终于赶走了残害人民的陕军。⑪到一九二五年前后，红枪会等组织遍及全省农村，自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声势日益浩大。但是，红枪会这种武装团体，成份复杂，既有贫苦农民，又有地主，甚至还有土匪、溃兵加入；其“领袖则地主、绅士和失意军人实占多数”。⑫在组织上它不是统一的整体，各自为战，行动不一致，彼此尚多门户之见，相互歧视；而且内部时起冲突，削弱自己的战斗力。在政治上更没有确定的主张和策略，易于被豪绅、军阀所利用。因此，这种自发的红枪会“未能成为农民解放运动的利器”，⑬有的甚至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灾难沉重的河南农民仍在黑暗中探索。

河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和国共合作以来的基本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策略和计划，⑭号召全党必须重视发动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中共四届一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通过了包括解决河南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决议案，并于十月十日发表了《告农民书》，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号召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为了培养农运人材，党派彭湃、阮啸山、谭植棠等同志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五年底，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主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为广东，同时也为广西、湖南、河南、安徽、山东、福建各省训练了四百五十多名农运骨干。”⑯因此，由广东兴起的农民运动，经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和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的风暴，有力地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河南的农民运动，开始于“五卅”运动爆发之后，⑰是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共河南党组织的领导和号召下发展起来的。它基本上经历了蓬勃兴起、曲折斗争、迎接北伐和深入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九二五年，是河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河南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胡景翼（原为冯的部属）率国民二军南下入豫，抵定中原，并任河南督军。这是一支刚从北洋军阀部队中分裂出来的具有一定革命倾向的军队，它虽然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封建军阀作风，但其领导集团中颇有一批进步分子；军长胡景翼曾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他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愿与广州革命政府合作。入豫前曾与中共北方区委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同志取得了联系。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特派王若飞等同志到河南负责党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豫陕区委成立，王若飞任区委书记），并与国民二军建立了统战关系。李大钊同志也曾数次亲莅河南指导革命斗争，同时从各地调派大批党团员到国民二军中作政治工作。当时胡景翼还通过李大钊邀请一些苏联专家、顾问协助他。因此，一九二五年春，河南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工人运动，在王若飞等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打破了“二七”罢工失败以来的沉寂局面。中州大地的革命空气骤然高涨。

不久，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河南开封、郑州、安阳、焦作、许昌、信阳、洛阳、汲县等城市的工商学界及市民群众，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开展宣传，进行募捐，组织学生军、敢死队，发表宣言和通电，大力支持上海和粤、汉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西华等县的农民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在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中共河南党组织根据党的“四大”的决议和广东省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决定指派一批同志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使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结成革命的联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了取得农民运动的经验，决定在荥阳县和信阳县进行试点工作。

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河南党组织派肖人鹄、戴培元、王克新、李兴育等同志分别到荥阳、信阳两县农村，调查研究、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由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工人罢工斗争的推动，深受压迫的广大农民具有了一定的革命要求，因此农运试点工作发展得很顺利。在荥阳，肖人鹄、戴培元等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于七月底和八月中旬，先后建立了水磨村农民协会和水磨区农民协会。在信阳，八月十八日，王克新、李兴育等同志成立了有六百多农民参加的柳林镇农民协会。^⑮这两地农民协会的成立，点燃了河南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提供了农运工作的初步经验。八月间，党派大批同志分赴铁路沿线各县农村，全面开展农运工作。^⑯

在王若飞等同志领导下，河南各地的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间，荥阳县已建立了水磨、贾峪、双楼郭、桐树王、双庙、潘龙、须水等七个区农民协会和六十八个村农民协会，^⑰会员达数万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势力。同时，争取红枪会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荥阳县东部、南部的红枪会大都与农民协会建立了统战关系。在此基础上，荥阳县农民协会也宣告成立。这是河南成立最早的县农民协会，参加庆祝大会的农民和郑州等地工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达两万余人，对推动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为了进一步提高农协会员的革命觉悟，在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各区、村农民协会大都开办了农民夜

校，除学习文化之外，主要向会员宣讲建立农民协会的作用和意义。当时，党的有关决议、宣言、农民协会决议、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的有关文章，都是农民夜校的常用教材。^{②①}

与此同时，信阳县的农民运动也得到迅速发展。该县中共党组织根据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在柳林镇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一批农运骨干，因而使农运工作获得较快地发展，到一九二六年二月，先后建立了十个区农民协会，会员五万余人。并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了信阳县农民协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七人。^{②②}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交，肖人鹄同志根据中共豫陕区委的指示，由荣阳到杞县工作。在杞县地委领导下，杞、睢两县的农运工作遂之展开。当时，杞县、睢县农民在红枪会的组织形式下，抵御溃兵、土匪、抗捐抗税，反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斗争，已很活跃。肖人鹄同志以农运特别专员的名义并运用荣阳农运的经验，很快打开了局面。他首先和杞县南部红枪会建立了联系，并以该地区为据点，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同时以红枪会为基础，组织农民自卫团。农运工作颇为顺利，到十二月底，先后建立了傅集、何寨及县西十里岗等三个区农民协会。^{②③}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区农民协会发展到十二个，村农民协会发展到八十多个，会员八万人。^{②④}二月一日，成立了杞县农民协会，^{②⑤}以张海峰同志为主席，以孔寅初同志为秘书长，执行委员七人，候补委员四人。是月，在县南何寨召开全县农民自卫团代表会议，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团总团部。县以下按区、村设立农民自卫团团部，分别受区、村农民协会领导。^{②⑥}与此同时，睢县也建立了一个区农民协会和九个村农民协会，会员约一万六千余人。^{②⑦}

许昌县的农民运动，在陈子林等的努力下，发展很快，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先后在石固、杜寨、五女店等地建立了四个区农民协会和五十八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三万五千人，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团。许昌县农民协会于同月成立，执行委员五人。这里红枪会在农运工作同志的积极帮助、教育下，大都倾向革命，因此“该县农协组织，纯以红枪会为中心”建立起来。^{②⑧}

郑州郊区的农民，深受郑州工人斗争的影响，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先后建立了永和、城厢两个区农民协会和五个村农民协会。并参照广东农民自卫军组织办法，成立了农民自卫军。^{②⑨}

此外，修武（焦作）、安阳、汲县、长葛、密县、洛阳、开封等县也先后开展了农运工作，建立了一些区、村农民协会。^{③①}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二军统治时期（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公开领导河南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历时八个多月，先后在十多个县开展了农民运动，建立四个县农民协会，四十一个区农民协会和二百七十四个村（乡）农民协会，会员达二十万以上，^{③②}加入农民自卫团或农民自卫军者有六万余人。^{③③}这些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的声浪中，开展了积极地斗争，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荣阳县农民对残害人民的劣绅、讼棍进行了清算斗争，并将一些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捕送监狱。对勾结豪绅、欺压农民的帝国主义分子——几处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进行了说理斗争，并将他们驱逐出境。^{③④}从而一度控制了该县南部和东南部的乡村政权；同时抵御溃兵、土匪，废除一切

苛捐杂税，使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杞县农协会员和农民自卫军万余人，于一九二六年一月，浩浩荡荡开进县城，武装示威，向县署提出了十一条要求，取得了部分胜利。^④

这一阶段的后期，由于国民二军的政策日趋反动，岳维峻（一九二五年四月，胡景翼病死，岳维峻接任胡职）公然下令解散洛阳农民协会，并大肆勒索军粮、军饷，激起广大农民的不满。但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农民协会仍以大局为重，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要求岳维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六年一月，信阳县柳林镇“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市民大会”分别致电岳维峻，呼吁国民二军贯彻“爱民初衷”，永作“人民干城”，承认广州国民政府，肃清北京卖国政府，建立真正之人民政府。^⑤同月底，国吴战争发生，吴佩孚军大举入豫，国民二军处境危急。为了支持国民二军抗吴，信阳、杞县、荣阳县农民协会联合许昌、长葛、郑州、密县、彰德、焦作、洛阳各区农民协会以河南二十万农民协会会员名义，于二月五日发表声明，宣布吴佩孚罪状，指出吴之东山再起，由鄂、鲁攻豫，蹂躏全豫人民，不仅是河南人民之公敌，而且是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全国同胞群起共讨之。^⑥

这一时期，河南的农民运动虽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党的领导缺乏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些过左的口号，致使农运工作遭受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荣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时该县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农协组织虽有数万之众，但刚刚兴起，尚待巩固。在此形势下，农运工作的领导者没有运用孤立、分化敌人的策略，反而过早地提出打倒劣绅、讼棍的口号，向中外反动势力同时展开斗争，因而促使劣绅、讼棍、天主教和不肖红枪会迅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农民协会。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贾峪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张虎臣全家被杀，就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反扑的表现。^⑦这就增加了该县农运工作的阻力，并给争取红枪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一九二六年一月底，这部分反动红枪会为吴佩孚所利用，举行大规模暴动，进攻荣阳县城，袭击国民二军后方，成为吴佩孚重占中原的内应。^⑧

虽然如此，这一时期河南的农民运动在全国仍占有重要地位。当时，除广东外，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均刚刚兴起，加入农协组织的人数甚少；其他各省区的农民协会组织更是寥若晨星。因此，这一时期河南的农民运动，在发展规模和人数方面均占全国第二位。它对北洋军阀统治下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党的教育下，河南广大农民提高了革命觉悟，由自发的反抗开始进入自觉革命的阶段。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是他们痛苦的唯一根源，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工人阶级联合战斗，打倒共同的敌人，才是谋求解放的根本道路。

不过，这一时期河南的农民运动与广东仍有着不可比拟的差距。广东的农民协会是以“贫农为中心”组成，^⑨基础牢固，组织严密，已成为坚强的农民阶级组织。它在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已控制了农村政权，并与地主阶级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的斗争，以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河南的农民运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农民协会大都以带迷信色彩的红枪会为基础组成，发动不充分，改造不彻底，贫农、雇农、中农虽占优势，但有不少地主、富农和绅士加入，因此，农民协会的基础不牢，组织松散，战斗力较弱，是处于低级阶段的农民阶级组织。同时由于对中小地主采取联合的政策，所以在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中没有提出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以满足广大农民的经济要求。这反映了在当时的河南农运

工作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未激烈展开。从运动的规模来看，与广东更无法相比，当时广东已有百分之六十的县开展了农运工作，造成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而河南仅有百分之十四的县建立了农民协会，远不能左右农村形势的发展。所以，在国民二军统治时期兴起的河南农民运动，虽有重要意义，但其基础急需巩固，规模急需扩大，斗争也急需深入发展，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在曲折的斗争中发展

正当河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豫省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九二六年一月，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吴佩孚部入豫，与国民二军开战。三月初，国民二军败退河南，吴佩孚重占中原，大肆镇压工农，使河南的农民运动遭受了严重摧残，被迫由公开发展转入秘密活动。

河南位于南北要冲，是未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必经的战略要地之一，断不能让吴佩孚任意摧残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明确指出：

“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必须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特别应注意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因此，中共河南党组织在吴佩孚统治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河南的农民运动。为了培训农运骨干，是年夏，中共豫陕区委调派二十九名优秀党团员骨干和积极分子，参加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⑩并全面了解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省会开封秘密召开了第一次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会者有十五县农民代表，共五十七人。河南省总工会和国民党开封市党部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讨论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宣传问题、组织问题和红枪会问题，并听取了《促成全国农民协会问题的报告》、《接受农民协会章程的报告》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报告。会议鉴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发出《促成全国农民协会代电》，同时派两名代表赴粤“晋谒广州国民政府，促请北伐，并出席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河南的实际和前一个时期农运工作的基本经验，制定了《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

《农民自卫团组织大纲》，决定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作为全省农民运动“集中统一之指导机关”。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讨论通过了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选举七人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四人为候补执行委员，⑪正式宣告了河南省农民协会的成立。这是河南农民运动发展的光辉里程碑，对于坚持和发展全省的农民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成立宣言》阐明了农民的苦难及其根源，指出农民在长期奋斗过程中已经认识了真正的敌友和自己应走的道路，省农民协会将领导全省农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土豪劣绅和官僚，谋求农民阶级的彻底解放。宣言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一面要很坚固地团结在省农民协会之下，一面更要扩大我们的联合战线——联合全国农民与我们农民利害相同的工人阶级”共同战斗。⑫

省农民协会成立后，全力领导各地农民协会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底，全省的农协组织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信阳县：柳林、杨家庙、平昌、当谷山、谭家河、董柏村等六区三十一村农协已恢复活

动，会员三万五千人。此外，红枪会已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者约万余人，分为南北两团，南团四千人，北团六千人。为了训练会员，已开办四所农民夜校，入校者六百人。同时，将各村农协会员划分为若干小组，以便进行学习和活动。

荣阳县：恢复整顿稍有头绪者有：水磨、蟠龙、双楼郭等三区十七村农民协会，会员达一万四千余人。

许昌县：该县农民协会组织基本未受损失，经过整顿又有发展，计四区五十八村有农协组织，会员五万三千人。其中在农民自卫团者二万五千人，有步枪八百支。

杞县：苏邢、傅集、西十里铺、原寨、贤区、惠济、起集等七区三十八村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五万人，农运成绩较佳。该县红枪会较多，内部复杂，经教育、争取，一部分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农民自卫团组织大纲》进行了整编。相邻的睢县农民协会组织也比较坚强，在斗争中得到了秘密发展。该县红枪会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大都站在农民协会一边。

密县：农民协会组织已有二区二十九村，会员一万二千人。其中红枪会加入农协者五千人，拟开办平民夜校，从事训练。

长葛县：过去曾有一区八村之农协组织，现已发展为三区三十一村，会员一万七千五百人。

郾城县：已成立一区六村之农协组织，会员一万五千人。其中红枪会加入者五千人，正着手改编为农民自卫团。

此外，安阳县已成立三区二十村之农协组织，会员二万五千人。修武县已正式成立二区二十六村农协组织，会员一万九千余人。汲县已有一区四村和两个特别村之农协组织，会员约一万五千人。^③郑州、洛阳、开封等地，由于吴佩孚统治甚严，农协组织尚未恢复。

在省农协的统一指导下，到五月底，除原有的四个县农民协会坚持斗争外，全省已有三十二个区和二百多个村的农民协会恢复了活动，会员人数约二十七万，其中加入农民自卫团者约十万人；开展农运工作的十三县，准备或着手进行的二十余县。^④同时，在党的教育、争取和影响下，许多地区受骗的红枪会已识破了吴佩孚的真面目（曾被吴欺骗，反对国民二军），开始向农民协会靠拢，有的还与农民协会建立了统战关系，或接受改编。至此，河南的农民运动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壮大起来。

在此阶段军阀吴佩孚为巩固在中原的统治，进一步向农民搜刮军粮、军饷，并加紧了对农民的镇压。一九二六年五月上旬至中旬，寇英杰（吴之部将、河南督军）派李鸿斋旅向杞、睢两县进攻，血腥镇压以娄伯循为首的紅枪会。紅枪会众在农民自卫团配合下，英勇抗击，不幸失败，群众被杀者七八千人，村庄被焚毁无数。^⑤白塔寨是个有五千口人的小镇（属杞县），除娄伯循一家事先逃出去外，全部被杀，无一幸免，造成了著名的豫东惨案。^⑥但是，在中共党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下已经觉悟了的农民并未屈服，反而更加奋斗，更加勇往；他们在死亡枕藉中，没有一点畏惧，没有一点灰心，他们高呼着：“前进呀！打败了，到广东去！”^⑦的口号坚持战斗。对于睢、杞农民的斗争精神，一九二六年八月份广东出版的《农民运动》杂志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睢、杞农民的革命“精神、真值得我们佩服！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必定要有了这一种自信的精神，这样奋斗的决心，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⑧

对于以河南为中心的直、鲁、豫等省的红枪会运动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中共中央极为关注。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四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为此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红枪会运动的决议案》。^④决议分析了红枪会运动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确定了党对红枪会的方针和政策。它明确指出：“红枪会为民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势力”。

“此种势力必与他种革命势力联合”，或接受他种“革命势力的影响”，才能减少失败和防止其反动化。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指导其势力，并使此势力不为一般军阀、土豪所利用”。各地中共党组织应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有力地指导机关”，“议定一致共同行动的政纲”，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军阀的自卫组织。对于“红枪会的迷信教条”，“不必积极地反对”，只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在农民运动中，为了使农民协会成为全体农民的组织，“更应注意以红枪会为农民武装组织；目前利用红枪会以发展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发展普及、充实后，更宜以红枪会为农民协会的武装势力”。决议强调指出：“现在如河南的特殊状态，无论真正农民的红枪会、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土豪利用的红枪会，皆反对张宗昌、吴佩孚；我们不可不使彼等结合成反对该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同时巩固农民的真正组织。”“若不能结合彼等使立于反对该地军阀政府的旗帜之下时”，我们的政策是：“应先取得群众——第一步，使真正红枪会不受其虚声恐吓，大胆独立存在；第二步，使土匪性质的红枪会不为土豪所利用，反立于农民方面，以抗土豪”。^⑤

中共中央的决议，为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河南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中共豫陕区委遵照决议精神和一年多来的实践经验，决定对遍布农村的红枪会展开全面工作，指导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军阀政府的压迫。对反动豪绅控制和土匪性质的红枪会，采取分化瓦解或孤立的政策，争取其群众倒向革命一边。对自耕农、佃农领导的红枪会，进行革命教育，使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以此为基础，直接建立农民协会，或以红枪会名义为掩护，将其改编为农民自卫团。对于开明绅士掌握的红枪会，争取其中立或与之建立统战关系；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在其中建立农民协会或农民自卫团。同时，联络各地红枪会首领，促使他们成立一个统一的指导机关。

在中共中央决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豫陕区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调派大批党、团员和农运骨干从事农运工作，加强了对红枪会的教育和争取，从而打开了河南农民运动的新局面——由坚持斗争走上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全省的农民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除原有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外，豫南确山县在张家铎、马尚德（即杨靖宇）、张耀昶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万余人，于二月十四日正式成立了确山县农民协会，马尚德同志任主席，执行委员七人。县东、县南、县北一带的红枪会、黄枪会等，均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指挥，在红枪会名义掩护下改编的农民自卫军亦达万余人。此外，遂平、汝南、西平、正阳、唐河、临颍、淮阳、洛阳、息县、商城、新乡、光山等许多县，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这些农民自卫军大都由接受中共党组织指挥的红枪会改编而成。与前一时期做法不同的是，先建立农民自卫军，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再组织农民协会。因此，许多地方只有农民自卫军，而没有农民协会的组织。

同时，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影响下，还建立了“河南全省红枪会联合总部”，把有革命倾向的红枪会联合起来，引导他们共同开展反抗军阀政府压迫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初，该“联

合总部”发出《告汴民书》，历数吴佩孚的罪状，指出吴对城市的“祸害并不比乡下轻，什么借收一个月的房租捐，立下洋油特捐，拍卖四郊护城地到五里以外，发行丝茶银行钞票五百万，强制行使有息证券，这都是安心立意要你们的命”。现在我们乡下的农民“再也不能忍耐了，豫西的弟兄们已经动手了，新安、宜阳、洛宁、登封、偃师的弟兄们已经实行抗捐抗粮，咱们全省各县弟兄们也准备起来响应”。《告汴民书》最后呼吁：“汴梁城内的同胞们！横竖是个死，到底死于摊派捐税的警察衙役之手，就不如和他拚命死了倒还光荣”，“你们若能鼓足勇气，敢于反抗，你们在乡下的弟兄们，誓愿作你们的帮手”。^{⑤1}

这时在革命潮流的激荡下，由林县崛起的豫北“天门会”，已发展到豫北、直南（今河南省南部）的二十余县，人数约有三十万，并与奉军连续展开三次大战，力阻奉军南下。河南省农民协会党团书记肖人鹄同志前往豫北慰劳，同该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反抗军阀。^{⑤2}同时，中共党组织派了一批得力同志到“天门会”做联络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动统治下，领导河南农民运动的第二个时期（自一九二六年三月初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历时一年，在艰险的环境里，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农运工作获得了新的发展。由于这一时期党组织采取了更加适应“河南特殊状态”的政策和组织形式，因而使农民群众中的各种革命力量纷纷聚集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旗帜下，日益向革命大联合的方向发展。不仅农民协会组织迅速发展，而且更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成立大规模的农民自卫军组织”，在“豫东太康、通许、睢县一带，豫南信阳、确山一带，豫西洛阳、登封一带，都先后有三万、五万或十几万武装农民所组织的联合办事处成立，全河南农民直接参加国民革命战线的不下十五万，连带影响所及的更不可数”。^{⑤3}由于农民革命的声威，“洛阳、汲县等地……军队不敢到近郊以外”；^{⑤4}豫北奉军只能在铁路沿线驻扎，而乡间则无一奉军；豫南信阳的农民“更能收缴不良军队的枪械，或召集农民大会，自行枪决劣绅土豪。”^{⑤5}“豫西洛阳等十余县之武装民团（即红枪会改编），大崛起，吴佩孚、张治公等几乎分文不能筹措于该地，且在军事上又予彼等以莫大之掣肘”。^{⑤6}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占两湖，克江西，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完全占领了华中的重镇——武汉。其前锋直抵豫鄂交界的武胜关。曾经疯狂多年的英帝国主义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余部仓惶逃入河南，苟延残喘。在此形势下，兴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风暴。两湖地区的农民群众奋起斗争，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地主特权，农民协会已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大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⑤7}地处中原的河南农民运动，虽然在组织程度、运动规模和斗争的深度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两湖地区，但是，它在军阀的统治下坚持战斗，并有很大的发展，严重地动摇着北洋军阀的统治，与北方各省的农运相比，是占着首要地位的。

奋勇战斗 迎接北伐军

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起，河南的农民运动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与奉系军阀英勇战斗，迎接和支援北伐军作战的时期。这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河南的残部已土崩瓦解，他的部将靳云鹗等大都输诚革命，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吴佩孚本人似丧家之犬，仅带少数卫队逃往四川。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数十万军队则长驱入豫，占领了河南的大部地区。靳云鹗以吴之旧部组成的“河南保卫军”，抗奉失败，于一九二七年四月间退至豫南郾城、驻马店一带。面对这种形势，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为了讨伐奉系军阀，入豫在即。

河南是北伐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因此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时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就明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原则，全国除粤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在一省之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河南——应注重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⑤一九二七年初，周恩来同志分析了河南的革命形势，预计到北伐军入豫的路线，指示中共河南党组织要特别加强豫南和铁路沿线的党团组织和群众的武装力量；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选择时机举行暴动，响应北伐军。因此，中共河南省委及时调整了部署，加强了信阳、驻马店、许昌、郑州等地党组织和农运工作的领导力量。^⑥这时由广州“农讲所”学习返回的农运骨干和由武汉返豫的大批革命同志也被派在豫南及京汉、陇海路沿线地区，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积极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

为了动员全省农民响应即将入豫的北伐军，在中共中央的关怀指导下，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武汉举行。河南四十五县农民代表六十九人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武装农民四十万。河南省农民协会和国民党省党部及开封市党部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于十五日在武昌雄楚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出席的来宾有：江苏、直隶（今河北省）、湖北等省代表及武汉市党、政、军机关、学校、总工会、省农协等五十余团体。中央“农讲所”八百多学员参加了会议。从十六日起举行正式会议，与会代表报告了河南各地的农运状况，听取了于树德关于河南武装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奉鲁军阀的政治报告，郑震宇关于河南农运状况的报告，陆沉关于湖北农民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李立三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发表了《反奉通电》、《反对奉鲁军阀决议案》和《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会议通过了《发展河南农民协会组织案》、《河南全省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以及《河南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会议选举豫南王慕燕，豫东孔寅初，豫中饶惠南、陈子林，豫西宋英等五人组成河南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⑦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推动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进一步实行武装农民大联合，举行武装暴动，打击奉军，配合北伐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和号召下，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到四月，河南的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豫南的商城县已建立了八个区农民协会，会员万余人，并建立农民自卫军三团、三大队、一中队。四月九日在该县南乡班竹园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执行委员七人，

候补执行委员三人，周汉卿、徐润亭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罗世宁任秘书。^{⑥1}在息县，已建立了三个区农民协会，会员一万入左右，并于五月成立了县农民协会。^{⑥2}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河南省农民协会和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根据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将各地农民协会和接受我党指挥的红枪会、黄枪会、义和团等武装农民团体，都用农民自卫军的名义统一起来，成立“河南省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由肖人鹄同志任总指挥。各地设立支队、分队，委任支队、分队司令，并发给关防（即印章）。自卫军建制不公开，只有骨干人员知道。在支、分队之下，没有正规编制，也没有严格的训练。这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条件下，为了便于集中革命力量而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农民协会或农民武装组织。^{⑥3}（在接近湖北的商城、光山、息县等地仍称农民协会或农民自卫军）。因此很快形成了联合反奉、迎接北伐军的大好局面，到四月底，据陈独秀在“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河南有组织的农民已发展到一百万。^{⑥4}

在农民运动大发展的同时，各地有组织的农民展开了抗粮抗税、武装示威、袭击奉军、围攻县城、夺取政权的激烈斗争。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确山、信阳、汝南、遂平、新蔡、上蔡、西平、正阳、罗山等九县农民奋起，向反动势力展开进攻。^{⑥5}四月，确山县农民在马尚德等同志领导下，攻破县城后，建立了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河南第一个县农工革命政府。^{⑥6}信阳县农民协会也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⑥7}从而为北伐军入豫扫清了道路。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由武汉进入豫南驻马店一带，冯玉祥所部的国民军也由豫西向东推进。各地中共党组织领导广大农民热烈欢迎革命军，并召开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打倒奉鲁军阀，同时愤怒地声讨了蒋介石屠杀工农、背叛革命的罪行。在信阳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到会者五十余团体，约一万余人。“凡柳林镇附近三十里内各村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即红枪会）、妇女协会、儿童活动团、商民协会、手工艺工会，皆团体赴会”。“军队方面，则有三十六军十三团全团及铁路队全队。实为河南柳林空前之盛会”。军民代表纷纷登台演说，一致表示“军民合作，拥护国民政府，打倒奉鲁军阀”。大会并“议决讨蒋及废除苛捐杂税，拥护工农利益等要案”。^{⑥8}在确山、驻马店等地均召开万人或数万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充分体现了军民团结、共同讨奉的坚强决心。^{⑥9}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北伐军和国民军分别向奉军展开攻势，战斗中，各地有组织的农民冒着枪林弹雨，挑茶担饭、救护伤员、帮助运输、侦探敌情、向导引路、扰敌后方，配合北伐军作战。

北伐军是国共合作的革命军队，纪律严明，粮饷充足，不扰民，不向群众派饭要粮。但是，战区的农民爱护革命军队，自动组织起来，送茶送饭，热情慰劳。当北伐军与奉军在上蔡东、西洪桥激战时，当地农民把茶饭送到阵前，就是生动的例证。

北伐军在河南的战斗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各个战场异常激烈，伤亡很大。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积极组织农民，协助医护人员，抬担架，送伤员。在上蔡战斗中，当地农民自动组成抬架队，争相抬送伤兵，有的送到部队各兵站，有的甚至送到百数十里的后方医院，使伤员得及时的救治和护理。

在战争中军事物资的供应、运输是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各地农协大力组织农民帮助运输。特别是在上蔡、西平、临颍大战中，他们只要看到革命军到来，就自动赶着牛车、推着手推车，挑着担子，迎上前去，为革命军运送行李、子弹和米面；甚至摘下自己的门板，拆掉房上的木料，送给革命军搭桥，使革命军能够迅速通过，不误战机。并给北伐军探听敌情，引导路径，使北伐军处于主动地位，能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如北伐军进驻驻马店后，当地中共党组织就派出五十名农民自卫军战士，做侦探，当向导，帮助北伐军作战。汝南的中共党组织成立的反奉委员会中专门设有向导组、谍报组和运输组等，领导农民自卫军积极做好侦探、引路和运输工作。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进入河南后，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洛阳农民武装也选派大批骨干为冯部引路、侦探，使冯军得以顺利地沿陇海路向东推进。

当北伐军在上蔡、西平、临颍等地与奉军大战时，豫东、豫西、豫北的武装农民，在中共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奋起战斗。豫东杞县、睢县、陈留、通许等县，十万农民大暴动，袭扰奉军后方。杞县农民攻破县城，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并指挥农民武装，积极策应北伐军作战。⑩豫西五万农民义勇队听从中共党组织的指挥，与敌人展开大激战。⑪豫北天门会的武装农民，先后“占领林县、辉县、武安、滑县，声势极为浩大”，并拟“分两路进攻：一路由彰德进驻磁州、邯郸一带；一路由新乡南取郑州，以肃清豫北逆军，并为第四方面军（即北伐军）之声援”。⑫所有这些都沉重打击和威胁着奉军的战略后方——开封、郑州、新乡、安阳等地，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国民军的前线作战。

在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河南百万有组织农民的大力支援下，以共产党员为先锋的北伐军，士气高昂，英勇战斗，迅速打垮了奉军主力。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北伐军与国民军会师郑、汴，底定中原。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⑬广大人民的支援和军民的团结一致，是北伐战争在河南迅速胜利的重要原因。

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随着北伐战争在河南的胜利，河南的农民运动开始转入第四个时期，即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前一个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是在联合反奉、迎接北伐军的旗帜下进行的。凡是反奉的农民武装，大都以农民自卫军的名义统一起来，或者以武装农民联合会、义勇队等名称组织起来，以利于配合北伐军作战。实践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在河南的特殊条件下是正确的，对北伐战争在河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集中表现在对基本的农民群众缺乏深入的发动和必要的阶级教育，农运工作变成了对红枪会领袖的接头运动。当然，接头联络是必要的，否则就无法深入其群众。然而接头之后应当深入下层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宣传教育，使其脱离地主、绅士的控制。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完全这样做，致使许多农民自卫军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地主、绅士甚至土豪的手里。他们虽然也反奉、支持北伐军，但多停留在口头和表面，行动有限。此种农民自卫军没有成为农民协会的武力，所以除反奉之外，不能实现农民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为了使河南的农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而迅速深入发展,一九二七年五月,河南党组织和武汉国民政府“慰劳河南军民代表团”在驻马店召开了汝、确、遂三县农民代表大会,通过议案十二条,⑦④一方面号召广大农民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一方面在革命军控制的广大区域内,迅速巩固、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同时开办农运训练班和农民自卫军训练所,加速培训农运骨干,并改造那些受地主、豪绅控制的农民自卫军,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协会的武力。这是新时期河南农民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不利于开展农村大革命,不利于农民反对豪绅地主阶级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间,信阳、确山、汝南、西平、遂平、郾城等京汉路沿线各县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建立。与此同时,以河南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先后在信阳、驻马店等地开办了农民自卫军政治军事训练所,各地中共党组织选派优秀党员和农运积极分子到训练所学习。信阳农民自卫军训练所招收信阳、罗山、光山等县九十八名学员,根据文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班,学习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教授三民主义大要,农民协会组织法,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中共党组织对农民的宣言和决议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华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等。军事课主要讲授军事知识,进行射击练习等。训练时间三周。⑦⑤驻马店农民自卫军训练所,学员一百名,均为确山、汝南、遂平三县的红枪会首领和青年农民骨干。该所由省农协委员、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陈子林任训育主任,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罗绍徵任教务主任,由各军政治部负责讲课。训练时间为两周。通过学习使学员懂得“革命理论、自卫军的组织和训练”办法。⑦⑥在这期间,中共河南党组织和武汉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还在京汉路沿线各县联合举办了八处农民训练班:驻马店一班,学生六十名;确山一班,学生六十名;上蔡一班,学生六十人;汝南、遂平、郾城、临颍各有学员六十人;西平县学生一百五十人,内有农民情愿自备之旁听生五十人。⑦⑦共计学生五百七十名。

这些由训练所和训练班培训的七百多名农运骨干,对于巩固、发展豫南各县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确山、信阳两县农工革命政府的群众基础也因此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在它们控制的乡村里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并向豪绅地主阶级开展了斗争。

正当河南的农民运动深入发展之际,风云突变。武汉国民政府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右派集团,继“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而日趋反动。一九二七年六月,武汉政府把河南地盘交给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控制,命令北伐军回师武汉,镇压两湖地区的农、工运动。经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汪、蒋合流,共同反共。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至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革命的工农运动也暂时被镇压了下去。

历时两年的河南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河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广东农民运动发展之后,最早崛起于北方,在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里,经过艰难曲折的激烈斗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在中原的统治,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对南

方的革命运动也起了积极地声援和配合作用。在大革命的后期,河南有组织的百万农民,全力支援和配合北伐军作战,对加速北伐战争在河南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次,河南的农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而深入发展。先后在豫南的确山、信阳和豫东的杞县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三个县级农工革命政权,开创了北方农工掌握政权的光辉范例。确山、信阳、杞县农民在农工革命政府领导下,于一九二七年四至七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巩固发展各种群众组织,稳定政权基础;发布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免除农民积欠的所有田赋;惩办、通缉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没收其财产;动员人民,全力支援北伐战争;及时处理民事案件,维护社会治安;开办平民夜校、图书馆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宣传革命思想;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所有这些,都奇迹般地改变着确山、信阳、杞县的面貌。农民的革命行动,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极大重视。汉口《民国日报》在确山政权成立时曾经指出:“农工组织政府,确山首先实现”,这“在革命史上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在农工运动史上也很有价值的啊!”^⑧同时,在国际舆论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汝南、确山、信阳等地逃到汉口的帝国主义分子——外国传教士,惊慌失措地说:豫南已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英国《泰晤士报》曾发出“中国河南出现苏维埃”的惊呼,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斯大林为此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在莫斯科与中山大学学生谈话中提及此事,并批驳了英人的谣言。^⑨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经受两年多英勇斗争锻炼的河南农民,提高了革命觉悟和阶级觉悟。他们接受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大革命失败后,广大农民怀念共产党,盼望共产党继续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信阳县四望山地区黄龙寺一家农民,“把‘共产党万岁!’供在桌上”,^⑩荥阳县水磨村农民张培泽,冒着生命危险,保存当年的农民协会印章直到解放,就是充分的例证。这说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运动,为后来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广泛地群众基础。

第四,由于河南的特殊状况,在两年多的农民运动中,曾经组织了大批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暴动,与军阀部队开战,从而使其受到了武装斗争的锻炼。在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农民领袖,造就了大量的武装斗争骨干。这就为而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第五,两年多来,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各地农村大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或发展了党员,形成了农村革命的战斗堡垒或中坚。特别是豫南农村的中共党组织更为坚强,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号召下,马尚德等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领导确山人民,举行了震动豫南的刘店秋收起义,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创建了农民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长达百余里的农村游击根据地,并与信阳四望山暴动的农民革命军汇合,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⑪一九二九年夏,豫东南商城农民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商南起义,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把坚持在确、信、桐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开赴前线抗日,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二师。不久,彭雪枫、李先念等同志也先后从确山竹沟地区带领一